

Sui Dynasty Calligraphy History

虞晓勇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隋代 书法史

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历程中，

隋代并非仅仅是六朝风气的延续，

而是「上接六朝，下开三唐」，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隋代石刻书迹分为墓志铭、造像题记、碑刻、

刻经和杂刻五大类。

墨迹书法是一个时代书写风貌的真实体现。

隋代墨迹书法主要是隋写经卷子和高昌王国延昌、

延和时期的文书残纸及朱书墓表。

隋代书法史

虞晓勇 /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代书法史 / 虞晓勇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102-05157-4

I. ①隋… II. ①虞… III. ①汉字—书法—美术史—
中国—隋代 IV. ①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7135 号

隋代书法史

虞晓勇 著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网 址 www.renmei.com.cn

电 话 发行部: 65252847 65256181 邮购部: 65229381

责任编辑 雒三桂 李宏禹

装帧设计 郑子杰

责任印制 赵 丹

制版印刷 北京彩桥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0 年 7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0.5

印数: 0001—3000

ISBN 978-7-102-05157-4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前人研究概述	1
第二节 研究的出发点与目的	3
第三节 资料的来源	4
一、书迹资料	4
二、文献资料	5
第一章 隋代书法发展的历史文化环境	7
第一节 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文化进程	7
第二节 领域渐宽、技术趋精的科技发展	13
第三节 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情况	16
一、亟须统一的经学学说	16
二、逐渐走向大融合的佛学	18
三、融合其他文化形态以求发展的道学	22
四、大融合中的文学艺术	24
第四节 历史文化环境为书法发展提供的契机	26
第二章 隋代的书法鉴赏与书法教育	34
第一节 法书的收藏与鉴赏	34
第二节 书法教育的发展情况	40
一、隋以前的书法教育	40
二、隋代的书法教育	47
第三章 隋代书家	55
第一节 书家群社会结构的变化	56
第二节 书法观念的变化	59

第四章 隋代书迹	66
第一节 墨迹书法	66
一、写经	67
二、其他墨迹	84
第二节 石刻书法	87
一、墓志	87
二、造像题记	111
三、碑刻和其他石刻	114
 附 录	121
一、图表	121
(一) 各年代石刻数量分布表	121
(二) 主要地区墓志分布表	123
(三) 隋亡宫籍贯分布表	126
二、隋代书家考略	128
(一) 江左书家	128
(二) 山东书家	133
(三) 关中书家	138
(四) 乡里不详者	140
三、隋代石刻书迹年表	140
 主要参考书目	161

绪论

第一节 前人研究概述

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历程中，隋代是一个关键时期。早在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一些金石学家在证经补史之余就对隋代书法的特点作了研讨。例如，欧阳修跋《启法寺碑》云：

予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而往往不著名氏，每持卷惘然为之叹息。惟道护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予家集录千卷止有此耳。^[1]

跋《龙藏寺碑》云：

右齐开府长兼行军参军九门张公礼撰，不著书人名氏，字画道劲有欧、虞之体。^[2]

跋《陈茂碑》云：

右《陈茂碑》，不著书撰人名氏，而字画精劲可喜。^[3]

又如蔡襄评价丁道护《启法寺碑》云：

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4]

可见，在宋代欧阳修等学者就已经洞晓了隋代书法的发展特点，肯定了隋代书法的艺术价值。欧阳修通过他所搜集的隋碑就发现，当时全国不少地区的碑刻，其笔画有“精劲”的风貌，并且认为，有些隋碑的风格颇似“欧、虞之体”。蔡襄甚至比他更肯定地说：“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这说明二人都认为初

[1] 朱长文《墨池编》卷16。

[2] 王昶《金石萃编》卷38第4“《龙藏寺碑》一条”。

[3] 王昶《金石萃编》卷39第3“《陈茂碑》一条”。

[4] 见刘熙载《书概》。

唐书风脱胎于隋，其观点也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好的启迪。

宋以后的一些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如都穆、顾炎武、王澐、钱大昕、武亿、王昶、陆增祥、叶昌炽、康有为和马宗霍等人，也陆续在其著作中对隋代书法的发展特点作了论述，其中尤其以叶昌炽和康有为的成果最为突出。与前人相比，叶、康二家更充分地认识了隋代书法的艺术价值，并高度评价了它在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在《语石》中，叶昌炽鲜明地指出了前贤在隋代书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说：

至隋则浑一区字，天下同文，并无南北之限。乃审其字体，上而庙堂之制作，下而闾巷之镌题，其石具在，未有如世所传法帖者。岂平陈之后，江左书派亦与国步俱迁乎？以此愈可知宋时阁帖，转展响拓，钟、王、郗、谢，半由虚造。余尝欲辑隋石记以明书法流别，觉阮文达南北两派之说，犹不免调停之见。章溪论唐初欧、褚诸家，一归之于山阴法乳，更为町畦未化已。^[1]

可以看出，叶昌炽在欧阳修等前贤的基础上，已经对隋代书法艺术的繁荣现象和融合特征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于隋代书法的历史地位，他认为：

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楷隶，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盖承险怪之后，渐入坦夷。而在整齐之中，仍饶浑古。古法未亡，精华已泄。唐欧、虞、褚、薛、徐、李、颜、柳诸家精诣，无不有之。此诚古今书学一大关键也。尤可异者，前人谓北书方严道劲，南书疏放妍妙，囿于风气，未可强合。至隋则浑一区字，天下同文，并无南北之限。^[2]

叶昌炽明确指出，从六朝到三唐的书法发展历程中，隋代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而康有为则从一定的文化史高度评价了隋代书法的融合特征，他在《广艺舟双楫·取隋第十一》中说：

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民国时期的马宗霍以更为洗练的语言总结了叶、康二家的观点，他说：

至于隋世，渐染南风，简要清通，汇成一局，遂以上接六朝，下开三唐焉。^[3]

[1] 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卷1，第20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2] 同上。

[3]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7。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以叶、康、马为代表的近代金石学家和书论家对隋代书法的繁荣现象和融合特征比前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他们认为，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历程中，隋代并非仅仅是六朝风气的延续，而是“上接六朝，下开三唐”，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这一评价和定位对一百多年来隋代书法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当代，一些书史研究者在叶、康理论的指导下，对隋代书法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陆续进行了探讨。例如，有的学者通过梳理隋代石刻书迹，对隋代书风作了分类，有的学者则通过比较隋唐时期的书法现象，认识到了隋代书法的发展趋势在唐代得到了深化，这些研究都大大丰富了今人对隋代书法的认识。

第二节 研究的出发点与目的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曾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1]书法艺术的发展也是如此。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发展必然是依托于整个时代的文化进程，文化的发展为它提供了基础和环境，反之，书法的发展又是文化进程的具体展现。只有把书法发展和它所处的文化背景统一起来认识，才能深刻发掘书法发展的意义和价值。隋朝是一个经历了数百年的南北分治后，重新归于统一的新兴王朝，隋代文化也是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充分交流和融合之后，形成的一种新兴文化，隋代书法作为隋代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特点。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的框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南北朝后期与隋代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作较为全面的考察，从而挖掘出这一时期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是隋代书法的本体研究，包括书法鉴赏与书法教育、书家、书迹三个方面。书法鉴赏和书法教育是与隋代书法发展直接有关的小环境，书家是书法活动的主体，书迹则是书家艺术创造的产物。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叶昌炽、康有为等前贤的理论，更能有助于今人全面认识隋代书法的发展状况、它与同时期文化发展的联系，以及隋代书法的历史贡献。

[1]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中译本），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三节 资料的来源

本书研究资料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为书迹资料，二为文献资料，以下分别阐述。

一、书迹资料

就书法史研究而言，原始书迹材料不仅可以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书法风貌，以及由此传达给我们的历史文化信息，还能反映当时文字书写载体的发展情况。隋代书迹的范围，从时间上讲，包括从隋朝建立到灭亡这一个时段（公元581—618），在空间上，其书迹主要以隋朝本土为重点，此外还包括与隋同时并存的高昌王国延昌、延和时期的一些书迹。由于这一时期的书迹字体以楷书为主，因而主要从载体上对其加以划分，分为石刻书法和墨迹书法两大类。

石刻书法 关于石刻的种类，金石学界历来就有很多种分法，其中以叶昌炽的《语石》最为详细，他将石刻共分42类，对于诸类石刻，标举无遗。此外，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中把石刻统分为四个大类，即碑碣、志铭、石画和刻经。马衡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又把石刻细分为碣、摩崖、碑、造像、画像、石经、释道石经、医方、格言、书目、文书、墓志、谱系、地图、界至、题咏题名、桥、井、食堂神位、黄肠、石人石兽、器物、石阙、柱、浮图等类别。朱剑心先生在《金石学》中则将石刻分成刻石、碑碣、墓志、塔铭、浮图、经幢、造像、石阙、摩崖和买地券10类。本书不是研究隋代石刻的金石学专著，而是以梳理与研究隋代书迹为目的，故从集中材料的角度出发，采纳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的分类方法，把隋代石刻书迹形式分为墓志、造像题记、碑刻、刻经和杂刻五大类。据杨殿珣的《石刻题跋索引》、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王壮弘和马成名的《六朝墓志检要》以及吴树平主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统计，共发现有书迹的隋代石刻500多件（具体数量参见附录），其中墓志、造像题记和碑刻是研究隋代书迹的主要对象。另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高昌卷》，在高昌王国延昌、延和时期，还有不少主要刻在砖制材质上的墓表书迹。

墨迹书法 墨迹书法是一个时代书写风貌的真实体现。迄今为止，我们所能

看到的隋代墨迹书法主要是隋写经卷子和高昌王国延昌、延和时期的文书残纸及朱书墓表。据台湾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统计，有明确纪年的隋敦煌写经达百余件，此外还有不少虽无纪年，但经专家鉴定确为隋人所书的经卷。另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收录了高昌王国延昌、延和时期的文书残纸百余件，天津古籍出版社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高昌卷》亦对该时期的朱书墓表作了比较详尽的收录，其数量有40多件，这对今人全面了解与隋同时期中国西部地区的书法风貌大有帮助。隋代的墨迹书法中还有一些或为名家，或是不知名者的书迹，例如，智永的《真草千字文》、《隋人出师颂》^[1]等。此外，敦煌遗存中也有一些隋人的文书残纸，如《隋科判残片》、《薛道衡典言》等。

二、文献资料

全面研究隋代书法的发展状况，除了书迹材料外，文献资料更是不可缺少，我们将与隋代书法史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直接或间接记述隋代社会生活情况的史料。这其中有的全面记载了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如《隋书》、《资治通鉴》和《全隋文》等；有的可以帮助今人从某个侧面了解隋代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如《南史》、《北史》、《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陈书》、《旧唐书》、《新唐书》以及《颜氏家训》等；有的则从不同角度记录了隋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例如：《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就记载了隋代的典章制度；《续高僧传》、《历代三宝记》、《法苑珠林》和《广弘明集》等佛教典籍则对隋代佛教文化的发展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而《隋唐嘉话》等笔记史料又记录了一部分隋人的文化生活情况。这类文献非常多，它们有的未必与隋代书法的发展有直接联系，但可以为后人研究隋代书法发展的文化环境提供依据。

第二类文献资料主要是前人对隋代书家和书迹作出的评述。这类史料多为唐宋书论家的书评，例如，唐代李嗣真的《书后品》和《九品书》，张怀瓘的《书断》，窦泉、窦蒙的《述书赋》并注，以及宋代陈思的《书小史》等。通过研究发现，这类文献仅仅对隋代书法的总体特征和少数隋代书家或是作品的风格，作

[1] 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说：“我仅见延光室摄影本（指隋无名氏书《出师颂》）。论书法很古厚，和日本现存的智永真草千文，大致相近。米友仁定为‘隋贤书’，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了简要性的评述，但从另一个视点而言，这些文字却较为直观地记载了唐宋书论家们眼中的隋代书法风貌。

第一章

隋代书法发展的历史文化环境

第一节 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文化进程

对于中国文化，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文化是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正因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我们要了解中国书法发展“一线传承”的历史，深入理解隋代书法发展的历史可能性，就应对中国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趋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

中国的先民有一个非常牢固的传统观念，那就是“天下观念”，这一点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儒家认为士人应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墨家推崇“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同”观念等，他们往往要求人们不应该抱有狭隘的国家观念，而要以天下事为己任。从中国古代民族的发展情况看，古代的中国人似乎彼此之间根本便不存在一种很清楚的民族观念，如果一定要对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确立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1]正由于我们的先民对国家和民族有着上述看法，因此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虽然有时会出现分裂，但融合却是根本的大趋势，中华民族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融合中走向了壮大。

通常来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往往是导致政治分裂的一大原因（这种文化具体是指政治制度与生活习惯），而每一次政治的统一通常又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

[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41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公元317年西晋灭亡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长达200多年的南北分治。在此期间，尽管南北政权分疆而治，兵燹频仍，但是在那个时期渴求统一一直是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

以北方为例，从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北方，这前后的120年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黄河流域遭受几乎彻底破坏的黑暗时期”。^[1]到了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灭掉了十六国中最后一个王国北凉，统一了当时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是什么力量促使当时的北方政权在各族分裂的局面下走向了统一？除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外，岑仲勉认为，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北魏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封建化进程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融合往往会有利于政治的统一。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正如陈寅恪所说：“北魏的汉化政策，应当说是一贯的政策，非孝文帝所特创。不然，鲜卑部酋便在北方呆不下去，便须返回塞外。只是前期的汉化带有不自觉性，被迫性。……孝文帝推行汉化，目光落到了如何使鲜卑贵族接受汉人士族文化之上，即如何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仅使鲜卑贵族有政治地位，而且使鲜卑贵族有社会地位，以此来巩固北魏的统治，并进而并吞南朝。”^[2]但是反过来说，拒绝文化融合，专溺于文化的分裂与倒退，则往往会导致政治的分裂。北魏后期六镇和尔朱荣的叛乱，实际上是以胡化逆流来代替汉化的民族融合，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北魏的分裂。因而，陈寅恪在总结北朝不能过早统一南北的原因时就明确认为：“主要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3]

当然，南方虽然代表着先进的汉族文化，但它也不能完成统一大业，根本原因在于南北方经济和武备实力的差异而造成的北强南弱的形势。

就中国古代经济而言，人口是一个极重要的要素，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是人口数量。对于南北朝时期的户口情况，唐杜佑的《通典·食货六·历代盛衰户口》有着十分清楚的记载：

（宋）孝武大明八年，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至陈之末年，隋家所收户五十万户，二百万口而已。……（后魏）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第254页，黄山书社1999年版。

[3] 同上，第229页。

及经尔朱之乱，东西流移，犹不下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户焉。……（北齐）至隆化二年，为周所灭，有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后周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

由此可见，十六国以后北朝的户口数明显多于南朝。在古代以耕织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优势就是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以军事而论，建立在部落兵制和府兵制基础上的北朝军队由于“有组织严密、骑术之精、斥候之明”的特点^[1]，他们的战斗力明显要强于南朝军队，这些都是南朝没有足够的能力统一全国的重要原因。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北朝和南朝都没能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但研究那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史，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北文化呈现出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北方士人热烈向往先进的南方文化。

陈寅恪认为，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都要比北朝先进。以经济生活而言，《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疏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四收分，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

可见南朝的工商业是比较发达的。此外，南朝的社会习俗也比北朝先进，在《颜氏家训·风操篇六》中可以看到，由于南北方对族人称呼的不同，而体现出的不同家族观念。其云：

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

北方人对宗亲称“从”，这说明他们看重同姓，并将其视为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是和北方大家族制度相对应的。而南方则称宗亲为“族”，这体现出南朝大家族离析，家族成员“异计”的情况。^[2]

通过以上对南北方经济生活与家族观念的分析可知，由于“南朝商业的发达，

[1]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第228页，黄山书社1999年版。

[2] 如《宋书》卷82《周朗传》即云：“（朗曰）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

大家族制度的破坏，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士族喜欢住到城市中去，且喜欢住在建康、江陵”。而“‘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这就决定了北方士族与农业土地的难分关系。北方大家族制度的继续维持，决定了北方的士人与宗族的难分关系。北方士族除了在京城和地方做官，都不住在城市”。^[1]南方士人居住在城市，文化信息的传播比较快，而且经常交流，必然能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南朝文化的发展自然也要比北朝快得多。

文化的发展通常呈现出先进文化同化落后文化的趋势，这一规律是由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这就好比“水润下”、“火炎上”的自然定理，因此，先进的南方文化对北方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我们在典籍中经常能找到北方士人热烈向往南方文化的事例。例如《南史》卷21《王融传》就记载了永明末年南齐接待北方使者的情况，传云：

上以融才辩，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曲水诗序》，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

由上可见北人对王融作品的爱慕。又《北史》卷47《祖莹传》云：

（祖莹）以才名拜太学博士。征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参军。帝（魏孝文帝）顾谓勰曰：“萧贇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今为汝用祖莹，岂非伦匹也？”敕令掌勰书记。

萧子良是齐武帝之子，以礼才好士著称，在他的周围聚集了王融等知名文士。元勰是孝文帝之弟，也以喜爱文学知名于时。当时祖莹在北朝以文学见重，孝文帝以王融和祖莹相比拟，也足见北人对南朝文士的倾慕。再以政治制度为例，也可以找到北人吸收南方文化的史实，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就说：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杂，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迨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

[1]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第330页，黄山书社1999年版。

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为“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

南北朝后期，南北通使等文化活动使得南北文化的交流不断加强，北朝文人的作品也同样得到了南方士人的赞赏。例如《北史》卷56《魏收传》记载：

收兼通直散骑侍郎，副王昕聘梁。昕风流文辩，收辞藻富逸，梁主及群臣咸加敬异。先是，南北初和，李谐、卢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为邻国所重。至此，梁主称曰：“李、卢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在途作《聘游赋》，辞甚美盛。

又刘悚《隋唐嘉话》云：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三月，离家已两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燕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故无虚士。”

从以上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南北朝时期，虽然南北方在政治上还没有统一，但是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呈现出逐步加深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北方文人爱慕南方文化的细腻妍丽，而南方文士则欣赏北方文化的清俊质朴。

到了南北朝晚期，两次重大战役更是把南北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向了一个相对的高潮，它们分别是公元554年的江陵之役和公元577年的平齐之役。《周书》卷15《于谨传》对江陵之役就有记载，其云：

（魏恭帝元年）谨乃命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率精骑先据江津，断其后路。……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

又据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载，西魏军队攻陷了荆州后，不仅劫掠了4000卷书画名迹^[1]，还掠走了一批南方名士，其中包括王褒、颜之推、殷不害、庾信等人，这次战役给南方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发生于周武帝时的平齐之役则推动了北方文化大融合向纵深发展（从地域的视角看，经过江陵之役后，所谓的北方文化大融合的文化范围已不仅仅局限在北方各地区，它已经包括了南北两方）。武平七年，周武帝以海纳百川的气魄把在北方的

[1]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云：“承圣末，魏师袭荆州。城陷，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周将于谨、普六茹忠等据拾遗逸凡四千卷，将归长安。”

南北文化名人都汇集到了长安。《北齐书》卷43《源彪传》云：

武平七年，周武平齐，与阳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敕入京，……齐灭，朝贵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书元修伯。

又据《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云：

周武平齐，（阳休之）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卫尉卿李祖钦、度支尚书元修伯、大理卿司马幼之、司农卿崔达拏，秘书监源文宗、散骑侍郎兼中书侍郎李若、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李孝贞、给事黄门侍郎卢思道、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陆义、中书侍郎薛道衡、中书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劭、陆开明十八人同征，令随驾后赴长安。

据史书记载，这18个被敕同入长安的北齐大臣都是饱学知礼之士。例如，阳休之“俊爽有风概，少勤学，爱文藻，弱冠善声，为后来之秀”。袁聿修“七岁遭丧，居处礼度，有若成人。九岁，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鉴识，清静寡欲，与物无竞”。源彪“以贵游子弟升朝列，才识敏贍，以干局见知”。卢思道“才学兼著”。颜之推“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萧）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李德林“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辞核而理畅”。薛道衡“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年十三，讲《左氏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王劭“少沉默，好读书。……时祖孝征、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这些饱学之士学问的渊源，有的秉承汉魏家学，有的深受南方文化的陶染，他们受诏共聚长安，无疑为北方地区产生更大规模的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经过文化的大融合之后，北方各民族之间狭隘的民族观念也逐渐被淡化。观察北周政权的情况可以清楚看到，北周朝廷中的股肱之臣，除了有鲜卑贵族中的上层，如元、长孙、宇文、陆、源、窦、独孤诸姓外，还有很多关、陇、河东一带的汉族世家，像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武功苏氏、上谷侯氏、陇西李氏、河东裴氏、薛氏、柳氏等等。另外，经过平齐战役，许多原来山东地区的汉族世家也加入到北周政权的行列中来，如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和顿